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二編 5

「我們」是誰？

—— 1945~1949 思索主權的文化邏輯

林封良 · 著

花木蘭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二編

第5冊

「我們」是誰？

——1945～1949 思索主權的文化邏輯

林封良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我們」是誰？——1945～1949 思索主權的文化邏輯／林封良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民
106〕

目 2+148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二編；第 5 冊）

ISBN 978-986-485-157-7（精裝）

1. 文化政策 2. 臺灣光復

733.08

106014094

ISBN-978-986-485-157-7



9 789864 851577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五冊

ISBN：978-986-485-157-7

「我們」是誰？

——1945～1949 思索主權的文化邏輯

作 者 林封良

總編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 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9 月

全書字數 142712 字

定 價 十二編 13 冊（精裝）台幣 2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我們」是誰？
—— 1945 ~ 1949 思索主權的文化邏輯

林封良 著

作者簡介

林封良，台灣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科技部台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專長研究領域為東亞現代性、東西思想史比較、當代西方思潮、文化理論、中國無政府主義文學與思想、東亞現代儒學、台灣戰後文化史，而主要著作與翻譯，散見於日本、台灣與中國各類期刊。

提 要

本書，是我透過 1945 ~ 1949 的史料，重新回顧國府初期的文化場域，以思考文化內部如何在主權意志的驅使下形成了社會文化立即的緊張與割裂。但是，本書也同時關注到國府初期在台灣知識份子如何思考主權本質化與封閉的性格，並在反覆問題化「我們」的過程中再次探索了不同的可能性，而這也是本書重返介入 1945 ~ 1949 年的思考起點。

通過 1945 ~ 1949 年文化史的追探，在本書中我們除了會閱讀到在一大時代背景下台灣的國民政府如何藉著主權意志的立場發揮其治理性的潛式 (potentiality)，我們更會體驗到當時在台灣兩岸文化人在面對強力的「中國化」論述時，如何藉著評論、書寫及文藝活動來構連出台灣文化不同於主權概念的想像。此外，本書更透過文化理論的視野，將台灣國府 1945 ~ 1949 年執行於「中國化」、「國民性」和「國語運動」的主權論述，擴展至對二戰後全球知識分配的理論性探索及方法論上的反省。

而本書，就是我透過 1945 ~ 1949 年的歷史動態所做出的研究。面對當時台灣文化在狹隘意識下造成的文化閹割，我企圖思索：究竟誰是「我們」，而我們又是「誰」？「誰」又能對「我們」驟然定義？在這此之間，是什麼認識結構形塑了文化的封閉和對立性？又是怎樣的問題貫徹及導引出文化自身的防衛和緊張？而這些認識結構該如何鬆解並引導出不同探問和思考的可能性？



目次

第一章 歷史的片段——誰在說我們的故事？	1
壹、研究動機	1
貳、歷史背景與文獻回顧	4
一、文化的詮釋——「中國化」邏輯的展開 與文化病狀的發生	4
二、僵固的置入——「奴化」與「中國化」的 論述操演	9
三、想像「文化」，特殊性與一般性的文化 詮釋	15
參、研究問題與章節安排	20
第二章 主權的邏輯形式——一般性與特殊性的 認識介入	23
壹、主權知識的閱讀	25
貳、主權的潛勢（potentiality）	30
參、與伊「逗（，）陣」（being with others）	38
第三章 主權的擱置——虛構「奴化與中國化」	47
壹、招魂納魄——主權的效益邏輯 vs 「去奴化」的 「中國化」訂製	48
貳、主權的趨同與剔除——傀儡尪仔 vs 黨化思想 的引渡	58
參、「中國化（話）」的隱喻——擱置地取消	68
肆、小結：乾癟的永恆——何為中國化？	80
第四章 特殊性與一般性——被湮滅的想像《橋》 的台灣新文學運動	83
壹、五四精神 vs 一種態度——範圍之外的探索	84
貳、文藝陣線的追問——被煙滅的發生	97
參、觸碰律動——台灣文學「特殊性」的「一般性」	111
肆、小結：思想的線段	120
第五章 結論——思索「我們」的故事	123
壹、思索主權——翻轉與開放的認識	123
貳、探問我們——另一次思索「分·享」與共同的 可能	126
參、《橋》的隱喻——思索主權與 polis 的可能	130
參考書目	137

第一章 歷史的片段 ——誰在說我們的故事？

壹、研究動機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失利，國民黨撤守台灣，為確立它在台灣政權的主導地位，遂啟動了黨內改造。^{〔註1〕}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國民黨政府在冷戰結構觸動下，不但拾取了國際戰略的邊防地位，更自此藉政治資源的運用，對島內文化執行高壓與壟斷的意識控制，以形塑出五〇年代與六〇年代台灣白色統治的基調，而使得台灣的文化場域中充斥了中原與大中國主義的論述型態。但是，這樣的論述樣態，卻在七〇年代後期產生了質變。

七〇年代中後政治局勢逆轉，在國際間喪失了聯合國的席位、中美斷交，而島內則引發了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的衝突，這一連串動盪都促使過去國民黨所極力穩固的世界逐漸鬆動。黨外活動興起與國際上脫離聯合國的孤立，是促使探索身份認同成為七〇年代末台灣島內思想主軸的緣由。這時文化場域中，先後出現現代詩與鄉土文學論戰兩個重大的文化現象，它所突顯的正是在七〇年代中，台灣面臨國際紛亂繼而思考要求回歸民族、回歸現實，

〔註1〕 在大陸內戰失敗後，蔣介石將失敗的原因求諸於黨員的腐敗、組織的鬆弛和軍隊士氣的低落與軍閥化，因此在一九四九年退守台灣後就開始構想「改造」的反省。而從此反省而導出的「改造」，不只是黨組織的整頓與改組，而是要克服黨內派閥，貫徹領導者的指導（「領袖獨裁」），以黨對國家機構（「軍、政」以及「特務」=情治機關）進行一元化的指導，重建政權為政黨國家。其精神為「以黨領政」、「以黨領軍」。黨是政府和軍隊的靈魂，也是導演、引擎，政府和軍隊不過是演員和車輪，進而使台灣成為政黨國家=黨國體制。

（Chen Hsiao-shih, *Party-Military Relation in the ROC and Taiwan: Paradoxes of Control*, Westview Press, Boulder, San Francisco, and Oxford, 1990, p55）

回歸中國文化的傳統與台灣歷史的過往，進而能夠從文化內部獲得抗拒外來動亂的力量。但也就在這種回歸的聲浪中，逐漸攜伴出台灣具體的真實影像。蕭新煌就曾經指出，在國際外力的衝擊下所產生的民族主義，似乎是「台灣意識」可以滋長的重要媒介。^{〔註2〕}因此，在「中國意識」的原則下「台灣意識」可以普遍獲得認可，真實的台灣也能夠在某種平衡與開放的狀態中逐漸被呈現出來，但同時也就在特定政治力量的觸發下，讓幾股內在的文化動力被激化。

「美麗島」事件，可說是揭開整個八〇年代政治局勢巨大變化的序幕。當時，因「美麗島」事件的帶動，1980年底台灣不僅補辦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更進一步舉辦了1981年省市公職人員選舉。這兩項政治活動標示了「黨外」力量的重整與集結，甚至是「迅速」完成了所謂「黨外再出發」的政治意圖，^{〔註3〕}其突顯八〇年代承接了七〇年代對於威權體制的反抗，和以此反抗展開對台灣本土化強烈的政治訴求。不過，可惜的是，八〇年代的「台灣本土化」意識在政治的選舉策略中被過度催化，使得「黨外」權力團體與國民黨政權間的省籍差異成為政治所操弄的象徵符號。尤其，在政治對立與政治利益的追逐下，所謂的省籍認同、鄉土認識與情感訴求都一再淪為政治廉價的操演對象，反而與其抗爭威權體制、追求民主政治的過程，逐漸脫逸開來。王振寰、錢永祥就曾在〈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一文中指出，過去的權威政體使用國族、或民粹邏輯，為的是消極地正當化自身與「容蓄」不同的省籍民眾，而現今的政黨利益，則積極地將此邏輯裝扮為政治動員的槓桿，藉由省籍、或本土的符碼區分進行「排除」。這樣的動員／排除政治，肇端於七〇年代末期那個以除自由化、除社會化的「黨外」，接到1986年成立的民進黨，再接到在李登輝掌權下本土化的國民黨政權。而如果說，從黨外到「本土化的國民黨政權」，並再經歷「政黨輪替後」的新政權是一民主化過程的話，這民主化過程是依賴省籍——國族身分的動員路徑而進行的。^{〔註4〕}

〔註2〕 蕭新煌，〈當代知識份子的「鄉土意識」——社會學的考察〉，《中國論壇》265期，頁56～67。

〔註3〕 李筱峰，〈黨外運動四十年〉，頁155；若林正文、松永正義合著（1988）《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政治》，頁63～65。

〔註4〕 〈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2003.10.4～5，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taishe/20031004_draft.pdf。

2000年政黨輪替，國民黨終究也結束了長達五十年的執政。然而，就在2016年的今天，我們卻仍然看到在政治操作下，文化、社會與省籍的對立不斷輪番上演。「本土意識」、「台灣精神」、「永續台灣」，就在這種種看似激烈、熱情的口號下，我們又該以怎樣的冷靜態度加以思考？出生於七〇年代的我，來不及參與保釣，更錯過了野百合，對於白色恐怖也有著間斷卻不清晰的距離。而現今社會、文化，卻在某種手段、利益、意志操作下不斷的否認，否認自己沒有想要成為強者欲念、否認著不同文化的脈絡、否認著立即卻又對立的爭辯，進而藉著否認而想要取消所有應該可能的認識，甚至是貼上「無愛台灣」的標籤再落井下石。^{〔註5〕}這一套套自圓其說的緊箍咒，不僅壓縮了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以來對於台灣文化豐富性的爭辯，更在政治操演的情況下急速地以「前瞻」、「正港」、「熱愛」的姿態搖旗呼喚。就在這種種的文化徵候中，或許，那個以往我們所抵抗的本質性力量並沒有真正離開。因為，遺忘、拒絕、否定和壓抑差異的誘惑，總讓人稱快。那壟斷性的動員，總返身在人們還相信，僅能依賴群體意志及有效價值的時候，也或就是，誤以為重新號召統合性的解放方案，才足以解開思想束縛的時候。尤其，當這些力量為遮掩台灣歷史內部的矛盾與複雜性，而迴避問題化「台灣歷史」的單向視角時，這一切看似合理卻又不加檢視的壓抑力道，恰好說明了該被反省的本質邏輯並沒有真正地被思索。

面對這樣的提問，我再一次藉著歷史的閱讀進入1949之前的台灣戰後初期，好重新理解這一切屬於自身，卻因為某種意志的切割進而感覺陌生的歷史，以企圖重新探問：是誰在說著我們的故事？而當你說著我們的時候，「我們」究竟是誰？此處，我所處理的工作，則是透過1945~1949的史料，也就是當時有關中國化、奴化、國語運動、國民性論戰、一般性與特殊性的討論、文化政策等等文獻，重新思考這些文字中對於文化內部主權意志、或是主權操作、治理與共同體開放可能性的思考。

〔註5〕李登輝指出，「在我從事民主化的努力過程中，有一項概念真重要，就是「認同」，因為住在台灣的人，那無認同台灣，就無可能會愛台灣，前後來到台灣的同胞，那無互相認同，也就無法度愛台灣。那無愛台灣，講民主也無可能，因為民主化，就是本土化。」；「民主化就是本土化。進一步講：民主政權，就是本地政權。咱在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本地政權以後，無想到有一些人，不但無誠心支持，而且想盡辦法阻礙，乎新政府無法度推動政務，乎百姓受到苦難。這些人同時暗中呼應中國大陸，講中共的好話，唱衰台灣，造成台灣政局的不安，大大影響咱民主化、本土化的進行，我非常憂心。」
http://www.tsu.org.tw/04_32.php

貳、歷史背景與文獻回顧

一、文化的詮釋——「中國化」邏輯的展開與文化病狀的發生

台灣該是什麼樣子？1945年台灣「光復」，在國府有計畫的引導下，意圖將台灣「中國化」的論述，卻激發了台灣在戰後初期文化上的矛盾現象。當時，戰後「祖國化」的口號風行各地，《民報》在社論〈中國文化的普及辦法〉中就曾指出：

台灣同胞在過去五十年間，實在不容易接受祖國的文化。譬如最重要的祖國書籍新聞雜誌，均受限制，雖抱有祖國愛的熱情，在日本人的壓政之下，實接觸不到祖國文化。光復後全省民最期待的，就是渴望接受祖國文化……對祖國文化的普及辦法，是目前本省重要的任務，其遂行效果如何，唯在當局之熱意是視。〔註6〕

由於在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民眾受盡了各種壓迫與剝削，因此台灣回歸不僅意味著台灣回到一個睽違已久的「祖國」，更意味著台灣人擺脫了日本統治下次等國民的地位。我們可以說，光復初期的知識份子雖對中國不一定陌生，但是，經過長達五十年的異族統治，台灣不管是在社會結構上、或是文化認識上，都與中國有著深刻與孑然異質的經驗。加上五十年以來，日本殖民政府對於台灣文化的箝制，不但抑制了台灣就中國文化較為全面的認識，也造成了接收初期於文化接觸上必然的困難。於是，如何重新認識中國的文化，便成爲了戰後台灣知識份子不斷思索與積極介入的場域。

但另一方面，「中國化」在國府政治的捉對下，它逐漸從認識中國文化的動機中脫離，而輾轉演變爲一種貶仰台灣歷史、殖民文化的論述。當時，陳儀在1945年二月的中學校長會議上表示：「台胞過去受著日本奴化教育，其所施之愚民政策不使大眾對政治正確認識」；因此，如果「本省過去日本教育方針，旨在推行『皇民化』運動」，那麼「今後我們就要針對『皇民化』而實施『中國化』運動」。〔註7〕於是，在這種政策的宣示下，「中國化」的認識產生了某種異態的質變，它逐漸從一種文化面向中的認識差別開來，而立即導向於對台灣日本異族殖民歷史的全面批判與肅清。當時，新生報社論〈肅清思想毒素〉一文就清楚的指出，台灣在日本殖民的統治下，思想上不知不覺中感染了無數的毒素，對於中國的認識也在日本有計劃的控

〔註6〕 〈中國文化的普及辦法〉，《民報》，35.9.12。

〔註7〕 《人民導報》，35.2.10。

制下逐漸顯得模糊，從中取代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與日本大和民族的頌揚。因此，該社論認為國府的「中國化」政策其目的就是要改造台灣同胞的民族心性，並且進一步藉著圖書、影視與教育的管制，來徹底清掃台灣文化中所殘留的殖民文化，以促使台灣文化的民族性格能夠符合「中國化」所期待的樣貌。〔註8〕

然而，從這幾個歷史線索涉入，我們不難發現國府初期將台灣「中國化」的論述設定，轉變成為戰後台灣社會文化中某種變異的收攏性動力：這樣的力道，它首先展示著戰後台灣知識份子回歸的情感，而在政策執行上，此「中國化」論述卻又淪為統治當局思想控制的最高指導原則。1945年底公署對於台灣行政、教育、司法的接收工作大致完成，但陳儀在茲念茲還是台灣心理建設的「中國化」政策。同年除夕，陳儀便頒布〈民國三十五年工作要領〉，在要領中陳儀指出為了廓清奴化思想，台灣同胞首先要進行的就是發揚民族精神，並進一步重新展開台灣同胞的心理改造。他認為心理建設的改造與語言文字、歷史有密切關係，所以陳儀期待在一年之內，全省同胞可以通用國語、國文、國史，而各級學校也必須以傳授國語、國文、三民主義、歷史為首要科目，也僅有在台灣真正成為中華民國的一份子之後，才能夠真誠的貢獻所能，幫助民國建構的完成。〔註9〕就陳儀而言，「中國化」一方面銜接著國家民族的精神樣態，而另一方面卻又與國家建國的論述發生關係，但在這種邏輯的配套下，國府公署的政策著重在催化島內社會與文化結構面向的改變，因此，語言、歷史與代表國家精神的三民主義，則成為國府公署勢在必行的國家政策。

也就在這樣的情勢下，「中國化」便在政治上以一種去「奴化」的論述姿態展演開來。鄭梓就曾經在研究中指出，此時的「中國化」論述不僅無法與社會現實發生關係，它更形成一種組織官僚所疊架出的怪異「中國化」形象。鄭梓在〈戰後台灣行政體系的接收與重建〉與〈試探戰後初期國府之治台策略〉兩篇文章中，分別就公署的行政體系來分析公署執行「中國化」本身的行政操弄。在鄭梓的分析中，他認為長官公署的行政規格延續了日治總督府的行政規劃，在其行政權能夠有效擴張的配置下，「中國化」的規格設定便成

〔註8〕 〈肅清思想毒素〉，《台灣新生報》，1945.12.17。

〔註9〕 陳儀，〈民國三十五年工作要領〉，《陳長官治台言論集》，35.5，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頁45。

為公署獨攬的意義詮釋；〔註 10〕也就是說，這時候的「中國化」意義座落在公署操作的機制之上，各種語言、教育、經濟、文化都在其所詮釋的「中國化」原則中，形成單向性的操作甚至成為迫害的手段。也因此，「中國化」在公署政權蓄意的建構下，它充斥著行政權力的介入與民族樣貌的強制規範。尤其，隨著「中國化」國民性的提倡，相應而生的就是台灣殖民歷史的「奴化」命名，而公署也就在經由「中國化」論述與行政結構相互搭配和剪裁之下，企圖藉著「中國化」論述與「奴化」論述的對立，以共同建構政權對文化詮釋的合法性，進而讓國府可以在「中國」正統的旗幟下鞏固主權自身的支配地位。

而這「中國化」論述的建置，在 1946 年「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施政方針」中，更進一步正式說明要透過台灣省編譯館與宣傳委員會兩個機構來加以倡導。黃英哲曾在〈台灣省編譯館研究（1946.8～1947.5）——陳儀政府台灣文化重編機構研究之二〉一文中，考察戰後初期公署的文化政策以及當時文化狀況的側面；黃文認為長官公署的中國文化本位政策係透過「台灣省編譯館」與「宣傳委員會」兩個機構來進行，而就在當「中國化」成為某種國家機制並加以展開的同時，它就立即演繹成一個由外而內，由上而下的「國民建設」，企圖計劃將新納入「中華民國」卻非「國民」的日本化台灣人給國民化。〔註 11〕於是，「中國化」的意識形態在「國民性」的架構中，獲得從容且足以推展的空間。此一過程，就在各級教育書籍配套、行政人員訓練和師資培訓與甄選的組合下，經由「中國化」將政治箝制付諸於國民化的實踐，並使這挪換取得正當性的語彙。當時《新生報》社論〈推行國語問題〉就曾寫到：

談□學習的人，我們以為不妨採自由與強迫兩種。就是依男女及職業分別開辦國語研習所、由欲學習者自由報名入校。另外就各戶分別調查勸導，必須有一人報名學習國語。這樣，自由與勸導併行，學的人必可以廣泛參加，而收到普遍的效果。〔註 12〕

〔註 10〕 鄭梓，〈試探戰後初期國府之治台策略〉《二二八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1992，頁 229～277；〈戰後行政體系的接收與重建〉，《台灣史論精選》，玉山社，2002.4，頁 233～272。

〔註 11〕 黃英哲，〈台灣省編譯館研究（1946.8～1947.5）——陳儀政府台灣文化重編機構研究之二〉，《台灣歷史學會會訊》，台灣歷史學會，1998。

〔註 12〕 〈推行國語問題〉，《台灣新生報》，34.12.18。

而這樣的意識展演出國府對於「中國化」的「期許」，同時也成為政權合理化與其背書的重要說法。在鄭梓與黃英哲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化」的論述不僅定製了台灣所需的文化樣貌，更藉由這種官方定製的過程，突顯了「國家機制」對文化涉入的強硬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鄭梓與黃英哲兩人的研究中，雖分析了國家結構對於文化、社會的介入與強硬的姿態，然而，回到歷史的材料我們卻不得不質問，面對國家機制的問題化我們是否正一再遺忘當時身處台灣的知識份子對「文化」脈絡的思考，以及他們如何將不同的文化經驗並置，好從中取得一個理解當代問題之差異視角的努力。故此，當我們在追問「奴化與中國化」如何執行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將其文化場域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相互聯繫，以再一次探究：當時台灣省內外的文人如何看待國家主權的壓迫？他們又如何相互的看待？他們又怎樣追問「奴化與中國化」的問題？

尤其，當我們回到 1945～1949 年的歷史情境中可以發現，台灣文化人當時對於中國與文化間的思考絕不僅侷限在政治操作之下。那時候，楊雲萍在公署推行中國化的處境中，就在《民報》社論〈促進文化的方策〉一文中語重心長地指出，

……我們是否認說台灣因為五十多年受了日本異族之統治，台灣已沒有文化可言之極端議論，作這種議論的，多是想要自高身價，排起著指導者的架子的。（我們想起，日本統治時代，日人也主張而且積極的宣傳台灣過去沒有文化。）他們對台灣的文化沒有研究過，或是調查過，只是看表面受了日本的統治，就以爲一定是沒有文化了，原來文化不是那麼沒有力氣的，或是被限的。不過，從現在的台灣的狀態而言，台灣的文化，確是呈現出一時的混亂和低下，因政治上的變遷，日本統治時代的文化要受嚴厲的再評價或是否定，而我國的新文化，又未能迅速盡量流入，我們要冷靜地承認這個事實，方能確立促進文化的方策。〔註13〕

此處，楊雲萍一則肯定台灣文化的價值，再則也面對當時混亂的局勢，試圖尋求解決之道，期待中國內地的進步言論能夠儘量與台灣交流，讓台灣的文化不再限定於特定的政治因素之上。本著相似的理念，1946年6月6日由官方與民間代表所組成的「台灣文化協進會」成立，當時本省籍的進步左翼，

〔註13〕楊雲萍，〈促進文化的方策〉，《民報》，35.2.3。

如許乃昌、王白淵與蘇新不但加入行列，更進一步參與推展會務的實際活動。而此時的文化協進會除了出版《台灣文化》月刊之外，還在月刊中詳實的概介了台灣文化的發展經過，積極地與大陸文化界進行交流。呂正惠就曾考察戰後初期的文化現象，他指出台灣戰後在知識份子有意識的推動下，五四、民主、科學與魯迅的批判精神成爲台灣與內地知識份子共同的語言。而這種過程，似乎也說明了思考社會、文化的另一種樣態；呂正惠認爲，台灣進步的知識份子透過與內地進步文化的交流，或經由內地書籍報刊的報導，早就認識到光復初期政治上的各種意識型態與矛盾衝突。也因此，在1946年「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總會」號召下，全省《中華日報》、《和平日報》、《台灣文化》都分別刊登魯迅專輯，企圖藉由魯迅、五四的引介來闡明文化能發展出更爲不同的精神與樣態。〔註14〕

徐秀慧在博士論文《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的考察》中，更進一步緊緊掌握日治以來對於魯迅的思想軸線，而指出台灣文化人就五四與魯迅的思想並不陌生，日據時代台灣民眾藉由日文、中文的傳媒譯介，早已熟知魯迅反法西斯、反封建的戰鬥精神。而戰後台灣與大陸的文化人雖然身處於歷史現實的隔閡中，但彼此卻不以省籍偏見相互侷限，進而努力突破中日戰爭中「國籍」身分不同所造就的文化差異，極力的促使兩岸文化交流，這不但使文化的詮釋不在一種意志作用下被壟斷坐大，更使得認識文化的多重視角在交流互動中不斷發生，展現其自身動態與豐富的樣貌。〔註15〕橫地剛更在《南天之虹》一書中，藉著當時作家黃榮燦的經歷說明當時兩岸知識份子如何像跨越海峽的南虹，經由文學、藝術、文化的交流相互往來，並且誠懇的思考著如何引介文化，「熱望與本省藝術者合作」，彼此在台灣的土地上握手，「交換經驗，促使台灣與內地的聯繫連接起來」，進而使得台灣與中國的文化在彼此作用下，可以發生更具有生命的樣態。〔註16〕因此，「文化」層面裡不同的思想資源，在兩岸文化人的思考下不必然成爲僵固的樣態；恰恰相反，藉著文化與歷史的認識，我們能夠發現文化本身的可能性就在於其自身的動態所轉換而來的豐富性，如果僅是以一種固定的「中國化」政策來侷限文化認識的可能，那它就勢必引導

〔註14〕 呂正惠，《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6，頁155～168。

〔註15〕 徐秀慧，《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的考察（1945～1949）》，清華大學博士論文，民93.7。

〔註16〕 橫地剛，《南方之虹》，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2，頁109。

著本質化的暴力與脅迫。這種暴力就如同當時文化人王思翔在《和平日報》〈論中國化〉一文中指出的，

隨著勝利而來，一種惡性的中國化正捉住整個台灣，……而現階段台灣的惡性狀態，與全中國舊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註17〕

再透過王思翔的陳述，我們更可以清晰的發覺國府初期兩種意義截然不同的文化動力。我的研究，也就是從這兩種思考文化的不同姿態加以展開。更確切地說，是將問題化「中國化與奴化」的論述，視為一文化「主權」辯證的切入視角，〔註18〕並透過戰後初期的台灣歷史軸線進行討論。在追問「中國化」所形構的緊張與壓迫的同時，也嘗試藉由當時文化人對「文化」的思索，來檢驗文化內部「中國化」與「奴化」的結構性認識，好再一次探問文化自身能動的可能性。就如同戰後，王思翔、楊雲萍突顯的，那不僅是對於一種「惡性中國」的追問姿態，更是另一種在「文化認識」上重新發問的可能樣貌。也就是說，面對這種文化動力的模態，我們除了必須質問國府所執行的「中國化」如何辨識「中國」？而又如何執行中國「化」？但另一方面，我們更必須質問「中國化」為何又僅能如此被辨識與執行？而為何需要「中國化」？就社會、文化的思考難道沒有更開放的姿態？然而，如果僅能如此被辨識與執行，國府所操演的「中國化」是否又隱喻了某種主權自身的封閉與索求的欲望？而面對這樣的封閉又該如何鬆解？怎樣鬆動？怎樣探問「奴化」與「中國化」和「主權」間的問題？爲了銜接這樣的思索，此處，就讓我們再一次進入「奴化」與「中國化」的論述繼續討論。

二、僵固的置入——「奴化」與「中國化」的論述操演

1946年內地的政治局勢持續的緊張，同年6月國共內戰爆發，要求和平建國、高度地方自治、反對獨裁政治爲內容的戰後民主化運動，在全大陸洶湧發生。同時，公署政府在「中國化」的政策上，卻持續執行著有關台灣文化該「怎樣」認識「中國」與該如何中國「化」的論述。

當時，宣傳會的主任秘書沈雲龍認爲，此時的「中國化」必須建立在「去日本化」的文化現象上，因此他便指出：

〔註17〕王思翔，〈論中國化〉，《和平日報》，1945.5.20。

〔註18〕而有關主權的問題，我在第二章將詳細展開。

單就日本人過去五十年所施於台胞的教育政策這一點而言，應毫不客氣來一個「反其道而行之」，或言之，即是日本人所散播的文化思想上的毒素，應該馬上予以徹底大掃除。〔註19〕

教育部長范壽康更指出，

皇民化的教育是不擇手段、費盡心力，想把住在台灣的中國同胞，都教化成日本人……變成爲供日本驅使的奴隸……甚至禁止他們閱讀現代中國的書籍……過去所受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皇民化教育，我們自然應該從速徹底加以推翻，用最經濟最科學的手段使台灣教育完全中國化。〔註20〕

而省黨部的主任委員李翼中就更在〈對當前台灣的文化運動的意見〉一文中，特意指出台灣目前的文化運動缺乏明確的領導中心，導致在台灣文化中許多的「日化現象」仍無法有效的根除。因此，他認爲必須藉著三民主義的總體目標，來確實糾正台灣文化中的日化樣態。〔註21〕但是，也在這種種糾正與清除的論述中，「中國化」透過公署的政治操演，封閉了台灣殖民歷史內的抵抗性經驗，並使得「中國化」以一種對立與僵硬的姿態開展出其自身意義的組織範疇。

就在公署執意推行「中國化」的政策之下，國語運動的配套就成爲公署急欲完成的文化作業。當時，《新生報》社論〈厲行國語普及〉一文就曾經指出，目前台灣光復首爲重要的就是國語運動必須雷厲風行的執行，尤其國語關係著國家民族的情感，如不能貫徹國語的執行，那所謂的台灣光復也僅是表面的陪襯而已。況且國語更進一步帶動著國家政治的行動效率，各種政治的運作都非國語不可，所以，國語運動的推展不但牽涉著國家情感的維繫，更是牽涉著社會進步的重要元素。因此，國語運動非雷厲風行不可。〔註22〕陳儀面對「中國化」運動的執行時，更在國父紀念週報中明確的回應，

文官任用方面，希望文官考試以日文考試，這一點是辦不到的。文官考試必須用國文，……對於國文，我希望我們要剛性的推行，不

〔註19〕 沈雲龍，〈台灣光復後的青年再教育問題〉，《現代週刊》創號刊，1945.12.10，頁3。

〔註20〕 范壽康，〈今後台灣的教育方向〉，《現代週刊》，1卷12期，1946.3.31。

〔註21〕 李翼中，〈對當前台灣的文化運動的意見〉，《台灣新生報》，35.7.28。

〔註22〕 〈厲行國語普及〉，《台灣新生報》，35.1.4。

能稍有柔性，中國有個毛病，什麼事不能斬釘截鐵的幹……，我們推行國文國語，必須剛性的，俾可增加效率。〔註 23〕

1946 年二月，陳儀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更於 1946 年十月二十五日廢除報紙雜誌的日文版。但是，也就在政治匆促的索求中，台灣的文人直接地失去了另一個發言與創作的管道。陳芳明就曾在〈戰後初期文學的重建與頓挫〉中指出，國府的語言政策，就台灣文學作家的文學活動而言，不難避免地構成了創作上嚴重的傷害，使台灣作家不得不強迫的染上歷史失憶症，也因此出現失語的現象。〔註 24〕許雪姬更在〈台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一文的分析中強調，行政長官公署在接收台灣一年後即廢除報紙雜誌的日文版，相較於日人統治完全推行國語運動也要到領台四十二年後才取消報紙的漢文欄，而這樣急速轉換台灣就日文的使用，正突顯了國府對台灣抵抗殖民歷史的忽視。因此，許雪姬認為當時台灣的文化人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雖然不至於有太大的反彈聲浪，但是針對於時間的迅速，卻突顯了語言政策本質上的剛硬態度，不僅忽視台灣民眾在語言轉換上的困難，更對台人缺乏同理心。〔註 25〕

另一方面，曾健民進一步藉著考察「國語」與「方言」之間的角度介入，而在〈打破刻板印象，重回台灣語言問題的原點〉一文中他首先承認，語言運動無法避免夾帶著暴力性，但是光復時期的國語運動不單僅是「國語」的推行而已，它更是藉著台語方言的運作來推展國語運動的執行。因此，曾建民以為在考察國語運動的推展，不應該僅是以狹隘的角度擺置在國府政策的壓迫上，而應該重新藉著「國語」和「方言」之間的聯繫關係涉入，理解在民族化的思考之下，國府藉著語言運動的推展，企圖創建現代國家的努力。

〔註 26〕

從上述研究的論點展開，不難注意到就在國府積極執行「中國化」的同時，不但企圖形塑了台灣文化的風貌，甚至造成台灣文人在創作與書寫上重大的創傷。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夠簡單地將文化上的限制歸咎於國語運

〔註 23〕 陳儀，〈民國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領〉，《陳長官治台灣言論集》第一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頁 45。

〔註 24〕 陳芳明，〈戰後初期文學的重建與頓挫〉，《聯合文學》197 期，頁 155。

〔註 25〕 許雪姬，〈台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29：490（1991），頁 184。

〔註 26〕 曾建民，〈打破刻板印象，重回台灣語言問題的原點〉，《因為是祖國的緣故》，台北：人間出版社，2001.1，頁 189。